

德昆西亞洲書寫中「能」的論述*

黃柏源**

摘 要

歐洲於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因醫學、人類學與科學論述興起，談論種族、身體與膚色的關連，尤以東亞地區與蒙古人種的相關性，一方面重新建立蒙古人種的侵略性，一方面重新強調其未開化的心智與落後，主宰了歐洲優勢對東亞的種族思潮（racial thinking）；而這樣的種族思潮，不僅再度強調了歐洲中心（Eurocentric）的本位主義，並為十九世紀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興起，提供了貌似科學的背書與正當性藉口。在此脈絡下，本文欲以英國散文家湯姆士·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作品《一位英國鴉片癮君子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opium Eater*）為主要分析文本，講述作者使用鴉片的經驗與想像。作者在《自白》中，展現服用鴉片所產生的、不同面向的能：鴉片先是產生驅策身體的「動能」（mobility），「才能」（capability）與「權能」（power）也應運而生；然而成癮之後，「動能」不再，「才能」與權能也隨之而滅。

除《自白》外，德昆西作品多次處理亞洲題材，包括〈喀幕克塔塔人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Kalmuck Tartars”），以及稍後的政治散文〈鴉片與中國問題〉（“The Opium and the China Question”），以及〈中國（一）〉〈中國（二）〉（“China (I)” & “China (II)”）等，討論隨著都市的拓展與帝國的擴張，作者的英國身份與歐洲文化認同如何面對亞洲的存在。本文將聚焦德昆西如何在其筆下的亞洲主題作品中，展現能的多重面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筆下，能的多重面向，恰恰

* 本文原以「他者的身體、本體的適應：湯瑪士德昆西作品中的亞洲動能與想像」為題，發表於第三十七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在此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出裨益良多之修改建議。

** 本文 105 年 12 月 16 日收件；106 年 4 月 10 日審查通過。

黃柏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語文教學研究中心專案講師（byhuang@ncnu.edu.tw）。

回應至當代歐洲對於亞洲——尤其是中國——態度的轉向。一如鴉片初始賦予作者的「增能」(empower)效力，在成癮的過程中，使得作者的身體成為「失能」(disabled)或「無能」(incapable)的狀態。也因之，在德昆西筆下，講述的其實是歐洲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充滿了「動能」，而用以侵略失能或無能的亞洲，使亞洲淪為文風不動(immobile)、任人魚肉的慾望對象。

關鍵詞：動能、才能、權能、德昆西

Aspects of “Ability” in De Quincey’s Writings about Asia

*Bo-Yuan Huang**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d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scientific discussions emerged and popularised the connections among race, body, and skin colours in Europ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ongolians and the East Asia wa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because Europe’s strong emphases on the aggressive and the “uncivilised” nature of the Mongolians not only gave rise to the Euro-centric racial thinking but also provided a seemingly convincing standpoint and legitimacy for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racism,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This article aims to scrutinise Thomas De Quincey’s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with opium use in his *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1821) in such contexts. In *Confessions*, the drug at first is an agent that empowers the writer, giving rise to his capability and power. Yet progressively, as the addiction kicks in, the drug becomes a destructive force that makes the writer suffer both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rendering the writer disabled and incapacitated.

In De Quincey’s other essays about Asia, such as “The Revolt of the Tartars,” “The Opium and the China Question,” along with “China (I)” and “China (II),” he seeks to deal with his English identity as he faces Asia in an age of urban and empirical expansion.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various aspects of “ability” in De Quincey’s writings about Asia. It is noteworthy that in De Quincey’s writings, the various aspects of ability correspond well to the shift in contemporary Europe’s attitudes towards Asia—especially China. With De Quincey’s opium addiction, the opium falls from an empowering agent to a destructive force that renders the writer’s body disabled or incapable. It is therefore my attempt to shed light on how Asia and China were often reduced to a desired object made immobile, disabled, and powerless by European powers, and were in need of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ven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De Quincey’s writings.

KEYWORDS: mobility, power, capability, Thomas De Quincey

* Bo-Yuan Huang, Lecturer,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byhuang@ncnu.edu.tw).

十九世紀英國散文家湯瑪士·德昆西 (Thomas De Quincey) 的著名作品《一位英國鴉片癮君子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下稱《自白》) 首次以匿名形式,¹ 於 1821 年 9 月至 10 月間, 在《倫敦雜誌》(*The London Magazine*) 上進行連載, 並於 1822 年合輯為書, 旋即在當代讀者間引發巨大迴響, 並於 1856 年進行增修。《自白》一書大致可分為〈自白序〉(“The Preliminary Confessions”)、〈鴉片之樂〉(“Pleasures of Opium”) 以及〈鴉片之苦〉(“Pains of Opium”) 三部分, 細細記錄其鴉片使用之經歷, 書中亦處處可見吸食鴉片的影響, 既有操弄精神的幻象, 亦有影響肉身之效力; 既有愉悅, 亦有痛楚。其中特別有意思的, 便是作者一再以鴉片做為媒介, 將自我形象投射於他者之上。他者往往是主體的慾望對象 (object of desire), 而作家總是藉由鴉片, 消解主體對於被他者同化而產生異化的愛恨掙扎。值得注意的是, 《自白》中作者對於主體與他者間的掙扎, 往往藉由「能」(ability) 的表述來展現。除了反映出自身面對亞洲/東方異化與適應的過程, 這些能的諸多面向, 更充分展現了作者面對亞洲主題書寫時的複雜性。²

長久以來, 評論家對於《自白》多所關注。貝若 (John Barrell) 援用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精神分析, 強調德昆西試圖藉書寫克服個人的創傷與恐懼。此外, 當時大英帝國擴張, 秉持歐洲中心 (Euro-centric) 的殖民主義, 企圖收編東方異文化卻未果的文化衝擊與恐懼, 與作者個人情緒兩相加乘, 使其筆下的亞洲與東方成了恐懼的來源, 並常展現於感官之上。在其書寫中, 亞洲是群體的、殘酷的、致命的。因此《自白》中, 作者對於己身的鴉片癮書寫, 也常是負面且妖魔化的。厄茲普卡 (Charles Rzepka) 則從人類學角度出發, 認為德昆西書寫中崇高感的展現, 常與主體性的消逝, 以及「禮物餽贈」(gift-giving) 所蘊含的犧牲美學相關。克萊日 (Alina Clej) 則認為德昆西直視藥物的書寫, 其實是面對被藥物異化而犧牲的主體, 在面對日常生活與世界失序時, 所亟欲解決的主體性危機, 也使德昆西成為領先時代的現代主義者。而希金斯 (David Higgins) 則認為, 英國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發展, 不僅使得鴉片交易高度便利, 也使得「大英帝國」與「英國」之分野愈形模糊。在此情形下, 作者的(英國)主體性與他者(帝國殖民的國家與文化)結構, 產生不穩定的變化, 也讓作者的自我認同進入不確定的狀態。

承繼上述諸位論者的看法, 筆者注意到, 無論是與藥物共處或抗衡

¹ 本文中所有德昆西作品引文, 皆譯自 *The Works of Thomas De Quincey*. Gen. ed. Grevel Lindop. 21 Volumes.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00-2003 此版本 (下以 *Works* 稱之)。本文中所有引文, 皆筆者自譯。特此說明。

² 亞洲與東方的概念雖有不同, 但德昆西的作品裡, 兩者經常是互換的。本文將主要使用「亞洲」一詞。

的過程中，德昆西的主體性建構，其實跟面對亞洲「能」的展現有相當密切的連動性。更精確而言，德昆西的英國主體性，在面對亞洲與鴉片作為慾望對象時，異化了主體的身體，使得主體在適應的過程中，包括在「動能」(mobility)、³「才能」(capability)與「權能」(power)等三個層面，展現「能」的多樣性。根據牛津大辭典(OED)的定義，「動能」係指在移動或被移動的能力(the ability to move or to be moved)，「才能」則係身體與心理的一般能力(power or ability in general, whether physical or mental)，「權能」則指強烈影響的能力(ability to act or affect something strongly)。若細究三字的釋義條目，雖各有不同，卻有許多重複疊合之處。此三字中，「動能」在近年來的學界研究中，獲得許多關注，已有豐碩成果展現，值得進一步說明。文化地理學者艾迪(Peter Adey)的《移動》(Mobility)一書，對於「動能」研究做出豐富駁雜的貢獻。另外，麥錫申(Charlotte Mathieson)亦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出發，藉此探究十九世紀的小說。她明確揭示了「動能」雖從「移動」(movement)的概念出發，卻不僅侷限於移動。麥錫申認為「動能」從過去所定義的「社會製造的移動」(socially produced motion)，在多方詮釋的擴充下，已非單純的主體在空間中的移動，而是與社會階級、性別以及種族有關連性的(13-15)。伯格爾(Miranda Burgess)則把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動能」，聚焦於「運輸」(transport)的進展。她認為當時工業化社會所造成的焦慮，以及「情感的流通性」(circulation of feelings)，使得「情緒的遊蕩」(vagrancy of emotions)所形成的情感與詩學，也成為定義當時浪漫主義的一部分(229-60)。而菲(Elizabeth Fay)更將情緒的遊盪推展得更遠。菲舉德昆西為例，強調德昆西的旅程往往藉由心靈與想像達成(而非實體的旅程)。菲認為德昆西的自我總是「不停止地移動」(endlessly mobile)，將夢境轉化成現實世界的「變形」(altered state)(292-312)。賈維斯(Robin Jarvis)也關注德昆西的移動，認為德昆西雖未如同代作家進行大量且有意義的實體旅行，但德昆西的精神旅行則發生於「加速的思緒與遲緩的意志」(accelerated thoughts and retarded will)所產生的內在衝突(74-87)。由此觀之，晚近文學研究中的「動能」豐富駁雜，似可涵蓋筆者在此所主張的「動能」、「才能」與「權能」等「能」的三個面向。但筆者認為，這三個「能」的面向，雖有許多疊合之處，但根據德昆西寫作展現，並加以細緻區隔之下，德昆西筆下的「動能」常與生理及身體連結，「才能」

³ 艾迪(Peter Adey)於2009年出版的《移動》一書中，揭示mobility的豐富駁雜的論述。筆者注意到，在徐苔玲與王志弘的中文譯本中，先將“mobility”的概念翻譯成「移動性」，希望與“movement”所代表的「移動」做出區隔；但原書名的mobility，譯者又翻譯成「移動」。為避免混淆，筆者在此採用「動能」一詞來翻譯“mobility”，因為mobility本身即是一種「能力」(ability)。原書請見Adey。中譯本請詳見彼得·艾迪。

常與心智活動相關，而「權能」則與政治經濟相互作用；而定義相互交纏的「才能」與「權能」，往往又由「動能」所驅策。也正因為「能」充滿複雜的呈現，使得德昆西在自《自白》以降的亞洲書寫中，作者的英國主體性，也往往呈現莫衷一是的搖擺狀態。本文正是希望藉由細究作者的散文書寫，揭示作者的英國主體面對亞洲題材時，「能」的多樣性之展現，以及與當代思潮的對應關係。

《自白》一書先以〈自白序〉開始。作者率先強調己身「英國」的身份，並昭告其以「學者」的姿態寫作，一再闡明其出身並非貧寒，並自豪其以「宗教般的熱忱」(*Works 2: 10*)服用鴉片，與其他業餘等級的使用者不同，預先為敘述者的身份定調。作者以倫敦的貴族或知識份子為引子，暗示其所屬社會階級與往來對象；繼為說明當代鴉片使用之便宜與普遍，作者舉例曼徹斯特的棉花廠工人因「工資低下」，「不容許他們沈溺於麥芽酒與烈酒」，所以他們「很快就開始使用鴉片」(*Works 2: 11*)。作者這樣的敘述，說明鴉片使用的普遍性，其實超越社經階級與身份地位。作者的設計，一方面係為自己使用鴉片的行徑開脫，非其特意獨行；一方面亦暗示鴉片的效用已超越己身，暗示鴉片的影響可能是更全面性、舉國皆然的。緊接著，作者先以〈自白序〉講述其初識鴉片，並非耽溺於享樂，而是為了「緩和最嚴重等級的疼痛」(*Works 2: 13*)。作者講述，從廿八歲起，為治療胃痛之苦，開始每日服用鴉片。而胃痛之始，實源於年少輕狂，他離家出走後落腳倫敦，將隨身小額財富揮霍殆盡後，開啟其於倫敦生存的痛苦時日。當時正積極邁向工業化與都會化的倫敦，讓身無長物的作者飢貧度日。在朋友的介紹下，暫且棲身於幾無住客的房舍中。在此他結識了一無名女孩，在偌大無人的屋內，飢寒交迫的兩人相依為命，共享饑寒交迫的肉體痛苦。無名女孩來歷不明，或為私生女或為侍女，當屋主來訪時，甘受屋主差遣。無名女孩將屋主的書房視為童話故事「藍鬍子」裡的密室，萬分恐懼；且因飢寒交迫，幻覺屋內鬼魂縈繞。年少的作者雖理智不信，但面對都會生活的嚴峻，以及女孩繪聲繪影的恐懼，兩相加乘、內外交逼，艱難的生活條件終究使其夜不成眠、噩夢連連，而噩夢導致身體的虛弱，身體的虛弱又誘發更多的噩夢(*Works 2: 21-24*)。作者仔細描繪此間身心折磨，為其使用鴉片之習預留伏筆。

作者得到資助遷居他處後，無名女孩亦不復見。兩人縱為「悲慘相伴」(*Works 2: 24*)，然而長相與資質都平庸的她，始終未讓年輕的作者念茲在茲。相對的，在某次夜間巡弋時，作者在牛津街偶然結識一名為「安」(*Ann*)的雛妓。可憐且無友伴的安，與作者同病相憐，提供作者肉體與精神的慰藉，因此年少二人相互為伴，情愫與身體慾望隱晦交織。安與作者常在牛津街附近的夜街上遊蕩。一次夜行時，作者胃痛難抑，安且

散盡微薄儲蓄，為作者買來紅酒與香料暖胃提神，卻從未要求作者回報。雖作者在社經條件低落時，安的陪伴係其身心救贖，但好景不常；當作者巧遇家族友人，得其資助，必須離開倫敦尋求金援，希望終有機會可回報安。然而，作者重返倫敦後，卻遍尋不見安的身影。安所提供給作者的肉體與精神慰藉，卻因為其消失造成缺席。在〈自白序〉的第二部分，作者自責無能回饋安的關懷與情感，更使得他夜不成眠。當慾望對象形成空缺，引發作者高度焦慮與內疚。由內疚與逸樂交錯的道德掙扎，導致焦慮與困惑。面對安不知其所蹤的失落，作者暗自悲嘆卻無能為力，調度智識說服自我，卻依舊無法平息苦痛。此部分戛然而止，留下懸疑，筆鋒一轉，以鴉片所產生的逸樂取代，開始講述其〈鴉片之樂〉。

根據作者自述，他初嚐鴉片係為解除頭痛與牙疼，並在牛津大學友人的介紹下，他前往牛津街一不具名的藥劑師處購買鴉片。在服用藥物後的一小時內，疼痛瞬間解除，作者因而大歎鴉片之精妙：「天哪！多麼大的變化！怎能從靈魂最低深處攀昇至此一狀態！」（*Works 2: 43*）。這天啟般的感受引領他在倫敦生活的期間開始耽溺於鴉片的使用。在《自白》的〈鴉片之樂〉中，作者盛讚鴉片之好更勝酒精，因為酒精束縛使用者，而鴉片卻能增加使用者的行為能力。在此，作者所談及的能力可分成兩個層面來看待：一為心智，一為身體。作者利用酒精與鴉片對比，細數兩者相異之處。除貶低酒精之樂在攀至高點後隨即衰退，如烈焰燃完便盡；作者且說鴉片之樂，長效可達八至十小時，如「穩定而溫煦的光芒」（*Works 2: 44*）。酒精令人「心智渾沌」，而鴉片則對心智「制定最精妙的秩序、法規與和諧」；酒精令人行為「怪誕放肆」，而鴉片卻能鎮定激動情緒，將分神意志重新聚焦（*Works 2: 44*）。面對當代英國境內鴉片使用，常與流傳的懶散土耳其癮君子形象聯想，作者亟欲自清，先是貶低土耳其癮君子吸食鴉片後的愚行，繼而強調鴉片在土耳其人身上所造成的逸樂懶散，不曾見於英國人身上。對於英國的癮君子而言，鴉片能夠增加行動力，甚至能增進智識能力（*Works 2: 47-48*）。因此，在鴉片的增能與酒精的失能兩相對照下，作者選擇了鴉片，並舉性喜杯中物的公爵友人相互對照，在兩人相約看歌劇時，作者相信鴉片使其更能領略樂音之妙，甚至歌劇院內的交談雜音也不再喧鬧擾人，連嘈雜的他國語言也能和諧如樂曲。於此，作者強調鴉片能令其將「有機的聲音」（*organic sound*）建構成「精巧的智力樂趣」（*elaborate intellectual pleasure*）（*Works 2: 48-49*）。因此，當作者強調鴉片強化其「智識」（*intellectual*），甚可增加其聆賞樂音之妙，說明了鴉片所賦予增加作者心智能力之「才能」。

作者強調鴉片可「增加心智活動」之外，鴉片也使得作者增加其身體活動的運作（*Works 2: 49*）。作者講述週六夜晚，服用鴉片後，他充滿活力，漫遊倫敦，可走上幾個小時亦不覺疲累。作者尤愛造訪東倫敦勞

動階級居住的貧民區。雖造訪貧民區常讓作者憶及年少時倫敦生活之苦，但見識參與貧民生活之清貧之樂，作者總能同享其「堅忍，希望，以及靜謐」(patience, hope and tranquillity) (*Works 2: 49*)。作者重申當他人同情這些貧民之苦，他卻能見識並同情貧民之樂。在多次造訪此區域後，作者愈形熟悉貧民生活種種，並參與貧民生活之討論，不時給予「有見地的」(judicious)想法，而這些貧民總「寬容接受」(received indulgently) (*Works 2: 49*)。若說作者聆賞歌劇時，鴉片增強心智能力的是「才能」，在作者週六夜晚的漫遊裡，鴉片則成為增強其「動能」與「權能」的中介物。一方面，作者藉鴉片賦予其「動能」，統整感官情緒，驅策他獨自漫步倫敦街頭，穿越盤根錯節的新興都會，相信仍有地圖上未載明、唯他知曉的「未竟之地」(*terrae incognitae*) (*Works 2: 50*)。另一方面，鴉片賦予作者「權能」，使其得以知識份子的身份「同情」這些貧民，並給予他們意見；也給與其以知識與經驗收編這些「未竟之地」的「權能」。然而，當作者承認貧民「寬容地」接受他知識份子的意見，作者亦暗示鴉片所賦予的「權能」終究是暫時且不穩定的；也因此，無論係在「智識」或「道德」(moral)層面，都造就其情緒上的「困惑」(perplexities) (*Works 2: 50*)。筆者推論，作者無法自外於良心的譴責，因為他曾是都會發展下排擠的一員，而鴉片所賦予其的「動能」與「權能」，更是凸顯其如今已非貧民的身份。當他具備離開與再訪的「動能」，他始終不屬於貧民區的一份子。相對地，當這些貧民不具備離開其社經階級與所居區域的「動能」，使得作者的「動能」並不僅是身體所經歷的漫遊，而是具備社經意義的「社會動能」(social mobility)。也因此，這些他曾造訪過的、熟悉的面容，在稍後的〈鴉片之苦〉中蠻橫「主宰」(tyrannized)其噩夢，即便動用理智「亦無法消解其內心糾結」(*Works 2: 50*)。

學者畢威爾(Alan Bewell)在《浪漫主義與殖民病》(*Romanticism and Colonial Disease*)中認為，倫敦都會區的勞動階級的居所，之所以是「未竟之地」，正因為貧窮以及人口增生，使得它在德昆西筆下與東方地理連結，進而成為帝國中心的「異地」(foreign place)。因此，德昆西筆下的「東方」，其實是「倫敦都會勞動階級的譬喻性代換」(a figural displacement of the urban working class) (158-59)。畢威爾的論述頗具意義，但筆者認為，必須同時考量東倫敦在十九世紀的倫敦發展史裡扮演的角色。當時泰晤士河作為海運與河運的交會點，西印度碼頭(West India Docks)與東印度碼頭(East India Docks)都建於東倫敦，⁴使得東倫敦成為海陸運輸與貿易之中樞轉運站，亦使東倫敦成為外來移民(合法與不合法兼

⁴ 有關西印度碼頭之發展簡史，請參參Hobhouse, "The West India Docks"。有關東印度碼頭之描述，請參參Hobhouse, "The East India Docks"。此外，當時倫敦的人口概念，亦可見Chandler and Gilmartin。

有)、船員、勞工、娼妓與黑市交易的溫床。因而由作者所經歷且高度私人化的地圖中，東倫敦與作者世界觀的東方產生隱晦的連結。也因此，筆者推論，若將倫敦都會的擴張視為當時大英帝國在海外拓展的縮影，那麼作者面對東倫敦這些交錯盤據、尚未命名的新興地區，便如同大英帝國在海外擴張遭遇東方國度時，亟欲命名、納入管轄且「私有化」(privatised)的土地。筆者也認為，唯有將東倫敦之拓展與作者世界觀的東方相互連結，才能進一步說明東倫敦新興的廣大勞動人口，如何成就畢威爾所說的，替代德昆西認知裡的東方。在鴉片的驅策下，作者被賦予的「能」實為身心兼具，包含了「動能」、「才能」與「權能」；但正如同他漫遊東倫敦貧民區時，以知識份子身份所獲得的優越感以及內疚，作者亦暗示了大英帝國在東方的海外擴張，藉由軍事上的優勢與「動能」，亟欲征服未竟之地時，歐洲中心的政經層面的優越感隨之而生，但這樣的「動能」依舊引發道德上的愧疚。在作者的鋪陳下，當倫敦作為帝國本體的象徵，作者反覆離開與再訪東倫敦的行徑，說明了在鴉片效力的催發下，作者的主體與東倫敦異地的價值交換益發頻繁，也越來越密不可分。透過鴉片效力的交換下，兩者越來越能易地而處。當優越感與愧疚感同源，鴉片所賦予的「能」也蒙上了陰影，使得造訪過、同情的臉孔亦成為噩夢的根源。同時，隨著帝國的擴張，鴉片作為亞洲他者所生產的物質與商品，⁵ 同時成為大英帝國在異地擴張的工具，卻也不意成為在英國境內各階層普遍使用的藥物。也因此，正如同倫敦包含著東倫敦的發展，帝國逐步擴張的軍事與商貿便利性，也讓鴉片不僅是他者，也成了英國主體的一部份。作者的身體也經歷了雷同的經驗：當作者的本體藉由「獲取」(acquire)以及「服用」(take)鴉片，鴉片的藥物效力也逐漸「馴化」(domesticate)作者的身心，成為作者主體的一部份。更精確而言，在「消費／消化」(consumption)的過程裡，本體與他者之間的分界逐漸消失，主要展現在三個層面上：作者的主體，倫敦作為帝國的 center，以及帝國的版圖。當作者服用鴉片，鴉片被作者的身體吸收，讓作者的身心必須適應藥效；作為帝國中心的倫敦，在都會擴張與社經階級的分野裡，也必須包含充滿勞動階級與外來者的、新興卻未知的東倫敦異地；而大英帝國的海外擴張，面對異文化，也終究必須面對異文化的洗禮與適應。也因之，在《白白》中作者情緒上的困惑，其實來自於本體與他者的二元對立逐漸模糊。

⁵ 檢視鴉片在此時期的歷史，鴉片由英屬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種植，並運輸至當代需求的市場。尤其在 1819 年時，英國在馬來西亞取得殖民領地，建立新加坡，成為英國在東南亞地區很重要的商業與軍事貿易點。也因為新加坡的地理便利性，鴉片更方便運送至東南亞，甚至到達位居東亞的中國，也成為英國殖民主義發展的工具。然而，也因為東印度公司的自產自銷，使得鴉片在英國境內能夠成為便宜、普遍的藥物。詳見 Krishnan。

在〈鴉片之苦〉中，二元對立的模糊更為顯著。在〈鴉片之苦〉中，作者著墨探索的，不再是城市漫遊的外部或公共空間，而是私人的、「家園之內」(domestic)的空間。此時作者的鴉片使用，已非如先前僅為逸樂增能，而係習慣性的、為日益惡化的胃痛所常備的止痛藥。在〈鴉片之苦〉的序言中，作者描述其居住鴿子農舍(Dove Cottage)時，某夜偶遇馬來海員登門拜訪，而於山中出生長大的英國女僕應門時，兩人因互不理解對方的語言而對峙，直至女僕請來作者為其溝通。作者描述這英國女孩的美麗臉龐是「如此精緻的美好，伴隨著傲然自立的獨立態度」(Works 2: 56)，相對於如「虎貓」般的馬來海員「蠟黃如膽汁的膚色」，以及其「小而熱切、不安份的眼睛」，以及「奴性般的手勢」以及對人「恭敬地崇拜」(Works 2: 57)，在在都看出女僕對於亞洲語言的不理解，以及馬來海員的外貌乃至行為舉止，係如何令其倍感威脅。馬來海員「侵門踏戶」的舉止，不僅來自異國的陌生人實體上侵入作者的居家空間，也象徵了異文化進入英國的文化力量，以及為即將提及的、鴉片對於作者身體／精神的侵入，所預留伏筆。

在英國女僕與馬來水手間的遭遇之際，英國女僕相信作者身為知識份子，通曉「世界上所有語言」(all languages of the earth)(Works 2: 57)，必能權充兩造間之翻譯，尤其是其所代表之英國與東方。然而，作者先是拖延這個機會(“I did not immediately go down” [Works 2: 57])，繼而發現自己實則無能為兩造傳遞訊息。然而，作者並未放棄「假裝」自己懂得馬來語且可為兩造溝通。他先是引用《伊利亞德》(Iliad)之片段，推測希臘與馬來亞的地理距離較為接近，盼望希臘語可協助其與馬來人溝通，但很快便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有趣的是，作者在此聚焦的是自己身為「媒介」(medium)，而非真正傳遞「訊息」(message)的可能性。學者厄茲普卡便指出，此亦成為作者與讀者關係之隱喻，因為作者在意的始終是自己書寫所建立的「權威」(authority)不會遭受暴露或挑戰(Rzepka 4-16)。當作者的翻譯失敗，但馬來水手卻仍對作者「恭敬地崇拜」行禮如儀，作者在意的並非是溝通的可能性，而竟是「因此我在鄰人間挽救了自己的聲譽，因為馬來水手無法出賣這個秘密」(Works 2: 57)。作者無能居中翻譯馬來語與英文，以及馬來水手無法藉由言說洩漏作者的秘密，面對溝通上雙重的「無能」(incapability)，作者唯一的溝通方式則是藉由餽贈馬來海員一丸鴉片。當馬來海員稍事休息，又即將上路時，作者基於認為對方為「東方人」(Orientalist)，「必定熟悉鴉片的使用」(Works 2: 57)，因此慷慨地贈與對方一丸鴉片；卻不料馬來人將鴉片丸分三份，囫圇吞下後便告辭離開。馬來人吞下足以致死的鴉片劑量，令作者感到焦慮萬分。如斯餽贈自相矛盾，既是禮物，亦是毒藥，因此引發作者高度焦慮，接連幾日都關注鄰近地區是否有馬來海員意外致死的消息，然

而最後亦不知其所終。雖然作者自我安慰，認為馬來海員必定安然無恙，且鴉片應能免除其遊蕩之苦，但心裡的愧疚與焦慮終究開始引發作者的噩夢。

作者的焦慮其來有自。在山中長大、不諳外語的女僕，象徵尚未接受都市化與帝國主義擴張的英國，其主體之「英國性」(Englishness)是純正的⁶；但馬來海員所隱喻之異文化的擴張，與女僕象徵的、傲然自立的英國性相互對峙時，暗示了帝國面對異文化不願退讓的強勢。而擔任兩者溝通翻譯的作者，雖然語言不通，卻假裝能與馬來海員相互理解。這除了暗示作者主體對於純正英國性的退讓，並因這樣的退讓，使其主體想像遭他者感染異化，是其終究不再純真。更令人玩味的是，當馬來海員欲離開之際，作者贈與馬來海員鴉片。作者對於餽贈的鴉片，除提及鴉片所提供之逸樂之能，更是強調了鴉片的毒物屬性。也因此，這樣的餽贈也顯示了主體的困惑。前述學者畢威爾認為，馬來海員的漫遊與疾病，其實正仿擬了德昆西年少在倫敦的自我流放與疾病。作者給予馬來海員之餽贈，顯示其愛憐遭鴉片感染的自己；然而作者所贈與足以致死之份量，則暗示其亟欲毀滅被感染的自己(Bewell 159-60)。筆者更認為，作者之所以亟欲加害馬來海員，除了馬來海員可能洩漏作者(在溝通上)的無能，正是因為象徵他者的馬來海員，具備漫遊與離開的「動能」，但定居於此的作者卻不再具備這樣的「動能」；也因此，唯有死亡才能使他者徹底噤聲，也才能阻絕他者的「動能」發展。然而，當作者的主體已遭鴉片效力影響，主體與他者也難以區分；作者選擇犧牲象徵他者的馬來海員，正意味著主體也犧牲了部分的主體性，棄絕了離開的「動能」。正因為如此，當作者的「動能」不再，作者的「才能」與「權能」也隨之犧牲。

因為棄絕「動能」，「才能」與「權能」也遭剝奪。這樣的焦慮與掙扎，一路延續到〈鴉片之苦〉。在此，鴉片不再具備增能之效，而是一再苛刻主體的能力。作者接二連三用了「軟弱的」(powerless)、「幼兒般」(infantine)、「愚蠢」(imbecility)、「靜止的」(dormant)、「無力」(incapacity)、以及「衰弱」(feebleness)等字眼(Works 2: 64-65)，形容使用鴉片後的負面效用，其實是身心兼具的。相對於前文所論及，鴉片對於心智能力與身體移動力所增加之正面效用，於此都煙消雲散。作者

⁶ 現代「英國」之概念，產生於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議會合併之後。而英國在十八世紀的進程，意謂著都市化、工業化以及現代性的逐步生成。筆者此處談及女僕所代表的「純正英國性」，係欲強調德昆西對於英國「本土主義」(localism)的驕傲與情懷，藉此強化英國女僕與馬來海員的對比。前述學者希金斯也認為，德昆西當代之帝國發展，亟欲收編同化殖民地異文化。然則，德昆西所懷持之英國本土主義，常與這樣的發展相對立(Higgins 174)。因此，當作者再三強調英國女僕的姿態，其實係強化本土主義的優勢；而英國女僕與馬來海員的對峙，可視為德昆西自身對於本土主義與帝國主義發展的抗衡。

甚至明列出鴉片的負面影響，除明言鴉片令其「畏懼動用心智能力」、其效用往往也伴隨「焦慮與陰沉的憂鬱」而來，甚至影響其時間感與空間感 (*Works 2: 66*)。因鴉片使用增加所產生的身體「禁錮」(imprisonment)，使得作者的身體愈趨無能，精神狀態也為之動搖。這也回應作者初至倫敦之痛苦遭遇，當年作者因饑貧交迫而虛弱無力的身體也遭遇類似的禁錮感，而精神上的壓力也隨之而至。如筆者前論，當作者選擇棄絕「動能」，便反映在作者愈形虛弱的身體禁錮中，而不知其所蹤的馬來海員，其「動能」正是作者缺乏的，而缺乏「動能」的主體焦慮更加強化了他者的「動能」，更使其幻化為噩夢。耐人尋味的是，當馬來海員再度出現時，並非單打獨鬥，而是呼朋引伴而來。這些揮之不去的人像，竟是早年作者漫遊東倫敦貧民區所見識的臉龐 (*Works 2: 70*)。當時作者具備離開以及再訪的「動能」，而生活物質條件缺乏貧瘠的居民們，被都市化以及社經階層的限制所禁錮；如今卻易地而處，主宰了作者的惡夢。換句話說，東倫敦與東方的連結在此更是顯而易見，而這也是為何在作者的認知中，「繁衍無度」、「群聚如雜草」的亞洲臉孔，具有逆襲作者英國性主體之能力。當他者具備「動能」，引渡作者「穿越」(transported) 異度空間，(地理上隸屬非洲的) 埃及、中國、印度的熱帶叢林與蟲鳥林獸，都被化約為主體不能完全理解的亞洲場景。在空間斷裂跳躍的噩夢中，作者有時感受自己被禁錮在塔峰或密室之中長達數世紀，他既是「祭司」亦是「偶像」，既是「被崇拜的」，卻亦是「被犧牲的」；有時則感覺自己被閉鎖於金字塔的石棺當中，與木乃伊及人面獅身像同處，且「遭鱷魚留下致命之吻」(*Works 2: 71*)。在作者的描繪中，洪水猛獸般的噩夢具備「動能」，遭他者異化過的主體，只能毫無抵禦力地任他者攜其來去，也因之產生「被崇拜」、「被犧牲」、「被禁錮」的被動語態。這些攜帶作者穿越異度空間的「動能」，正是作者過去擁有、如今卻失去的「能」。面對高度異化後的主體，不再是原初的主體，也因之作者不再具有「才能」或「權能」。在作者的噩夢間，或在南亞或在中國，其「生活模式」、「禮儀」與「憎惡的界線」與「缺乏同情」，都讓作者驚駭莫名，亦非其理智可分析，作者甚至以與「瘋子」以及「野蠻動物」共存的生活描述之 (*Works 2: 70-72*)。這種「共存」的模式，正是作者失去主體主動「動能」的最精確描述。此外，除了精神上地理空間的來去，作者一再被噩夢撼動的情緒，更是取代了身體在實體空間所實踐的「動能」。換言之，正是因為作者的身體被禁錮，使得「動能」發生變異，而以精神幻象與情緒上的被動「動能」(being moved) 取代之；也因此，作者的情緒既是「憎惡」(loathing) 又是「著迷」(fascinated) (*Works 2: 71*)，因為在主體與他者的價值交換中，他失去了所有的「能」，面對自我只能困惑以對。在愛恨鼎峙與失能的掙扎中，唯一救贖是作者的孩子，其純潔與童真殷殷召喚，才能讓作

者自惡夢中醒來。東方夢魘之可怖，對照英國孩童的純真臉龐，讓作者淚流滿面，以親吻自己的孩子，才能短暫消解惡夢侵擾。

作者因失能掙扎所產生之噩夢，終究要訴諸「能」的重新獲得，才能消解噩夢侵擾。如同筆者前述，安的缺席開啟了作者的道德內疚與自責，鴉片則替代安做為主體的慾望對象，開始影響作者身心。因此，作者在〈鴉片之苦〉的最後部分，在某個復活節早晨，在英國的山間，夢見了尋覓多年卻不得見的安。安的再度出現，除了「復活」的隱喻象徵了慾望對象的回歸，也終究預示了鴉片效力的消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敘述此夢場景仍是相當「東方」(oriental)，仿若其「幼時曾看過的耶路撒冷」印象。在聖城與復活節所象徵的時空之間，安昂然佇立其中。作者激動之餘，對安說道：「我終於找到你了」；然而雙唇「未受污染」(unpolluted)的安，不發一言，寧靜自立，雙眼滿是淚水，表情甚至有些「肅穆」，作者凝觀之餘亦感「畏怯」(awe) (*Works* 2: 73)。在這樣具有高度宗教意味的場景裡，安的重現也象徵了作者英國主體的回歸，這也說明了為何作者凝視安所感受的畏怯，因為安是純潔、未受污染的英國性主體，而作者當下已是遭鴉片異化過的失能主體。當一轉眼，安的影像再次消逝，鴉片引渡兩人穿越時空，重回十七年前，重新夜遊倫敦街道，兩人並肩行走，復歸純潔少年。當作者的原初慾望對象回歸，主體重新獲得部分「動能」，因而他者又再度被棄絕。作者自述，在夢中重見安之後，鴉片的效力逐漸退弱。某夜夢裡，在震耳欲聾的樂聲中，作者「動也不動地躺著」(lay inactive)，經歷了宗教儀式般的場景，才終究揮別了鴉片的夢魘 (*Works* 2: 74)。

《自白》中作者所書寫的鴉片，除了是其筆下所描繪的「輕便的狂喜」(portable ecstasies)，更是其鍾意的「運輸工具」(vehicle of transport) (*Works* 2: 43)。有趣的是，“transport”在此並不單指實體空間距離的「運輸」與移動，也包含了情緒上的「欣喜若狂」。也因此，「輕便」與「運輸」兩個詞彙，都包含了實體的行動動能，而「狂喜」與「欣喜若狂」則說明了情緒動能。⁷ 艾迪的《移動》一書，亦揭示了「動能」的多重定義，並不僅囿於由身體或實體空間所實踐的「動能」，亦包含了精神空間與感官所發生「情動力」(emotion) (162-72)。筆者認為，《自白》一書中，鴉片所引發的藥效主要係提供作者「動能」，尤其是「地理動能」(geographical mobility)：個體於地理空間移動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move around the geography)。⁸ 在〈鴉片之樂〉中，鴉片的增能 (empowerment)，

⁷ 前述學者伯格森亦持類似看法。伯格森注意到“transport”除了「運輸」之外，亦指「激烈的情緒」(vehement emotion)。詳見 Burgess 234。

⁸ 在此，「地理動能」(geographical mobility)有別於人文地理學所談、著重人口移居所用詞彙「地域流動」(geographic mobility)。筆者需說明，本文所談及之「地理」(geography)，正如同此

不僅增強作者聆賞音樂的「才能」，甚至能增加驅策作者漫遊城市空間的「動能」，並賦予其出入貧民區、發表意見的「權能」。以此觀之，「地理動能」增強的是作者主體的主動「動能」，強化作者在都市空間的移動性。然而在〈鴉片之苦〉中，鴉片在被作者服用之後，作者的本體產生變異，適應上的困難與困惑也應運而生。當鴉片負面效力漸次加強，所衍生的禁錮感，固然讓作者的身體失去主動的能力，僅能採取被動語態；但鴉片此時所賦予產生的「地理動能」，將作者的心神意志運輸至陌生的文化語境，成為挾持作者心智的動力，因此「動能」與「才能」的意義在此產生重疊。作者的主體不再產生主動力量，而象徵他者的鴉片強迫作者的本體適應，因此在地理動能的驅使下，主體只能採取被動姿態，使其適應上的困難與困惑更加明顯，「才能」與「權能」也都漸次被剝奪。兩相對照下，〈鴉片之樂〉的地理動能，係以身體與行走，收編實體空間；而〈鴉片之苦〉中的地理動能，則是藉由鴉片效力所產生之「動能」，穿越抽象的精神空間，進行文化繪製（*cultural mapping*）。因此，在〈鴉片之苦〉中的地理動能，當作者遭鴉片效力再三穿越時空，使其在文化與地理上混雜，消弭遠東與近東間之差異。作者無意也無能（*incapable*）精確理解眾文化間之差異，而將亞洲文化的差異性，化約成籠統且單一扁平的、相對於歐洲中心文化的「他者」與「異文化」。當作者寫下「長久以來，鴉片的帝國建構在歡愉的幻咒之上；然而正是亟欲棄絕其折磨的想望，反而更讓鴉片統御」（*Works 2: 74*），更揭示了他者的「權能」凌駕於作者之上，作者的身心只能臣服且無能為力。當鴉片最後允許作者在夢中主體召回慾望對象，並藉由最後的時空穿越，令作者喚回部分主體的主動「動能」，作者招認，雖其試圖戒斷鴉片，但直至《自白》篇章結束，其仍受鴉片影響，也揭示其終究仍未尋回真正完整的主動「動能」。換言之，《自白》一書完整揭露了作者如何藉由鴉片增能，轉向失能、無能的擺盪與掙扎，雖然最終召回部分的「動能」，但在此過程中喪失的「才能」與「權能」，使作者稍後在面對亞洲他者所產生的困惑與掙扎時，更加不留情面，也更加暴烈。

事實上，德昆西對於亞洲題材的關注，自《自白》起便愈形增加，而這些亞洲（廣義的東方）或許各有獨自風采，卻更常在充滿歐洲中心（*Eurocentric*）的主觀意識臆想下顯得面目模糊。例如，在《自白》首次出版後的兩年，德昆西對德哲康德（*Immanuel Kant*）作品於1764年出版的作品《美感與崇高感的若干觀察》（*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當中的〈論國家特色〉（“*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進行重譯。雖然此文意欲比較各國的美學觀，談及東方

門科的「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的兩個研究範疇，並不僅限於實體的地理空間，亦包含了人文地理的理解與想像。

亞洲諸國時，當中「最為尊貴的」阿拉伯人，雖可視為「亞洲的西班牙人」，但其美學觀仍是傾向「野蠻與不自然的浪漫」(the barbaresque and the unnaturally romantic) (Works 4: 155)。值得注意的是，在亞洲諸國的描述中，康德之原著，對於當時歐洲盛讚中國的美學觀點產生質疑；然而德昆西的譯本，在處理中國的部分時，擅自將原著的註釋，挪移入正文內，甚至擅加若干如「至為粗鄙的無知」(grossest ignorance) (Works 4: 157) 等詞，強化原文對於中國的篇幅與負面觀點。類似的情形尚可見於 1837 年，德昆西的另篇散文〈喀慕克塔塔人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Kalmuck Tartars; or, Flight of the Kalmuck Khan and His People from the Russian Territories to the Frontiers of China”)。此文亦非德昆西原創，而係改寫自德國作家伯格曼 (Benjamin Bergmann) 的作品。⁹ 此文講述西蒙古最後的可汗渥巴錫，因俄羅斯向中亞地區擴張勢力，迫使其率領本部人民東遷，企圖回到祖先的家園，但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後，只剩下約三分之一的人民成功重回蒙古西部，並在承德避暑山莊接受乾隆皇帝的接待與冊封，並移居裕勒都斯草原。在德昆西筆下，這一次的遷徙幾乎帶有寓言式且悲劇性的色彩。喀慕克民族屬於「中間者」(in-betweeners)：政治上，喀慕克民族既不屬於俄羅斯，亦不屬於中國；宗教上，既非基督徒亦非回教徒；種族上，既非高加索人，亦非蒙古人種。這樣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使得喀慕克人的旅程顯得格外具有意義。在這篇散文的最後數段，德昆西寫道：

〔喀慕克人〕他們的處境從此不再相同。他們的社會繁榮在質量上獲得很大的改變。他們不再是單純的游牧民族，而是成了主要依賴農業的情況，社會地位上大為升遷……在政治特權上也獲得很大改善，毋須服役。以此看來，喀慕克人當前的處境都只能算是得利的。但唯一的缺點在於，因喀慕克人的東遷，遙遠的距離使其永久失去皈依基督教的機會。在當前，沒有基督教信仰，喀慕克民族便失去走向真正文明的途途。(Works 9: 206)

對喀慕克人而言，游牧生活的遷徙與「動能」，與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季節遷徙或資源分佈所必要的逐水草而居，是群體具有目的性的、主動的「動能」。然而，在此文中的喀慕克人，由於政治勢力壓迫而強制產生的、不情願的遷徙，「動能」不再是主動的，而是轉為被動。在文章的發展脈

⁹ Pickering & Chatto 版本在此文收錄前的短序中，指出此文脫胎於德國作家伯格曼於 1804 至 1805 年出版的作品 *Nomadische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ücken in den Jahren 1802 und 1803*。此書於 1825 年譯為法文版 *Le Voyage de Benjamin Bergmann chez les Kalmucks*。德昆西的寫作主要大幅度改寫自法文版，並參酌若干早期耶穌會教士的作品。請參酌 Works 9: 171 的說明。

絡下，喀慕克人面對遷徙，身體的「疲憊與飢渴」、行動的「不便與苦痛」，甚至與其他民族間所引發的戰爭，幾乎使其滅族（perish）（*Works* 9: 187-88），更使其「動能」在這不情願的遷徙中被再三消耗。在敘事旅程的最後階段，當「動能」幾乎完全耗盡時，最後的冊封與定居則顯示了「動能」的不再可能（Adey 40-71）。因此，德昆西選譯喀慕克民族的遷徙也值得尋思。喀慕克人的旅程幾可視為猶太人出走埃及（Exodus）的仿擬之作，只是喀慕克民族最後所定居的，並非應許之地，而僅是庇護、依附而非真正的救贖。真正的救贖之所以不可能，正是因為在地理位置上，喀慕克人遠離了基督教文明的範圍。當喀慕克人歸化於中國，接受中國作為政治實體與文化的庇護，即便中國文明、政治實體以及軍事實力優於喀慕克民族；但與基督教文明所涵蓋的歐洲列國相較之，中國仍是屈居劣勢的。換言之，若以作者所採用的歐洲與基督教中心論的觀點視之，中國文化並非真正的知識產出地。因此，喀慕克民族的遷徙「動能」，終歸是種妥協，因為其雖接受冊封、獲得穩定的生活，卻失去了傳統以及游牧生活的自由與「動能」；雖獲得中國的政治庇護，卻非真正由歐洲與基督教中心所認可的文明與救贖。也因此，由於喀慕克歸順的中國文化並非「真正文明」，在德昆西眼裡，喀慕克民族的遷徙，雖然看似在政治與社經地位獲得賦能（enabled）的可能性，但實則係喀慕克民族流離顛沛、無所依歸的失能誌。

上述兩篇文章所處理的德昆西之書寫，雖以亞洲為題材，卻以翻譯改寫為主，中國在當中也僅算是聊備一格的配角，或曇花一現的對比。在《自白》中，中國僅僅是作者噩夢難醒間的場景；在重譯康德裡，中國在歐洲所引領的風尚，不過是言過其實、不能理解的「愚行」（fooleries）（*Works* 4: 157）；在〈喀慕克〉一文中，中國也祇是提供庇護的政治勢力，甚至不具備歐洲認可的、「真正的」文明。然而，在繞行中亞與南亞之後，德昆西終究得前往這個令他高度焦慮的國度：中國。事實上，中國始終是德昆西持續關注的題材，也是他著墨最為詳盡的。德昆西於 1822 年所作的〈鴉片與中國問題〉（“The Opium and the China Question”），便是德昆西首次完全專注於中國主題的篇幅。英國社會在歷經 1792 至 94 年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以及 1816 至 18 年的安姆赫斯特（Lord Amherst）兩次使節團出使失敗後，英國輿論對於中國態度丕變，從尊崇中國文明，轉而鄙視中國的外交與經濟政策。中國此時亦採取鎖國政策，有意阻絕外來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此文雖於 1822 年寫就，卻推遲至 1840 年才發表。在寫作與發表中的十八年間，中英外交關係有了急遽的變化。此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據點勢力迅速擴張，中國成為其於遠東地區最關鍵也最重要的市場。東印度公司藉賄賂中國地方官員進行走私，使鴉片在中國沿海地區的需求廣泛增加，藉以平衡歐洲對於中國商品貨物之

高度需求所製造出來的貿易逆差。1893 年林則徐的禁煙活動，以及義律 (Captain Charles Elliot) 袒護鴉片走私，再加上英國水手醉後打死尖沙咀村民林維喜等近因，終究使得中英兩國在〈鴉片〉一文出版兩個月後，發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鴉片〉一文並非高度原創的作品，充其量可視為德昆西對於當代英國知識份子，以及十八世紀以降，諸多歐洲知識份子對於中國想像的整理。除了出使中國所受到的外交挫敗新觀點之外，德昆西承繼笛福 (Daniel Defoe) 筆下中國與歐洲間商業貿易的觀點，認為中國與外來商人的貨物交易多採白銀或貴金屬；若英國持續迷戀與中國商業交易或走私，英國所產的貴金屬將被中國攫取，此舉甚或嚴重影響英國經濟。¹⁰ 雖說笛福的觀點主要立論於當時歐洲對於中國瓷器進口之風潮，而德昆西的論述主要奠基於十九世紀的鴉片走私，兩位作家對中英貿易利益失衡相當焦慮，擔心削弱國力。面對這樣的焦慮，德昆西將中國貶為「微不足道的文明」(petty civilisation)，並比較世界各國的經濟實力，將英國尊為上位，卻將中國視為在各國中政經地位最低的 (Works 11: 545-46)。德昆西且說「停滯的中國，毫無動力，在本質上毫無改變的希望」(Works 11: 546)。德昆西認為中國「無能擁有真正文明」，在禮儀與技藝工法上僅是「半文雅／半精緻的」，而在道德上則是「無可救藥的野蠻」(incapable of a true civilization, semi-refined in manners and mechanic arts, but incurably savage in the moral sense) (Works 11: 555)。因此，英國必須明確地「對中國進行軍事遠征」(Works 11: 556)。在這裡，縱使不難理解德昆西亟欲尋求縮減貿易逆差、或是強調中國政經與文化體制僵化的說法，但其於文中的呼告，恰恰展現了中國並非徹底地失能；或更精確一點描述，中國打從一開始便是「無能」的。德昆西對於中國「無能」的看法，更是一路延續到 1857 年寫作的政治散文〈中國(一)〉(“China (I)”) 與〈中國(二)〉(“China (II)”)。〈中國(一)〉無甚可觀，大抵是重述中英兩國自馬戛爾尼使節團失敗以來的外交糾葛，但〈中國(二)〉中，德昆西進一步持續對中國無能的描述。在這篇散文中，德昆西建立本體與他者的寫法昭然若揭，一再強調兩者區別。在政治實力、經濟、憲政體制、宗教、文學等層面，作者認為相較於英國國力的「雄偉」，中國毫無見識；更有甚者，作者將中國比擬成一具龐大、罹癌的身體，但更可悲的，中國甚至「不具有讓癌細胞擴張的部分」(Works 18: 132)，而面對這具槁木死灰、母親般的身體，中國人們根本無從冀望獲得母親的溫柔慈愛，亦無法尊崇母親。換言之，中國做為身體的象徵，是一具沒有器官、沒有精力，也是染病、瀕死、無能的身體，而作者得以大聲疾呼征服這具他者的身體。

¹⁰ 關於笛福討論中英之間的經濟面向，可參酌 Starr。

從以上的文本分析，筆者發現，當德昆西作品所處理的「亞洲」與「東方」，在意義上經常是毫無區隔的，並且在歐洲中心以及基督教中心的主導下，「亞洲」與「東方」也缺乏地理實體的本質，文化想像上也缺乏景深而顯得扁平。換言之，正如同德昆西的文學批評觀點所宣稱的，「知識文學」(literature of knowledge)與「力量文學」(literature of power)兩者間的區別，「知識文學」的主要功能是「教導」(to teach)讀者，而「力量文學」的主要功能則是「感動」(to move)讀者(Works 16: 332-53)。以此觀之，對於「東方」與「亞洲」的題材，德昆西從來就不欲訴諸智識上的真正理解，而是藉助書寫此題材，展現情緒與精神上的情動力。若以筆者此處所探討的「能」觀之，作者在這一系列的亞洲主題之書寫裡，主題能夠藉由書寫達成「能」的展現。正因如此，作者的「能」並非恆定的單一指涉，往往更是交纏駁雜、莫衷一是。正如《自白》所展現的，始於生理的「動能」，總會進而影響心智活動的「才能」；而身體與精神狀態，亦可成為居住空間、都市與帝國的縮影，也有了政經活動的干預。相對而言，亞洲的他者在德昆西書寫與主觀意識的主導下，始終缺乏真正的主動「動能」。在《自白》中，他者唯一展現的主動「動能」，來自於主體噩夢中的地理動能與「空間位移」(displacement)。然而，在重譯康德時，中國在其筆下成為停滯不前的文明，失去發展的「動能」，無法跨越的文化藩籬，使中國無法提供歐洲中心文明可理解的美感經驗；在〈喀慕克〉一文中，中國所提供的政治軍事庇護，僅僅是喀慕克民族失能後的居所，而非基督教文明所認可的應許之地；在〈鴉片〉文中，中國具有可輸出歐洲所需物質的經濟實力，卻因鎖國與故步自封，造成中英貿易逆差，輔以英國出使中國之外交挫敗，因而遭描繪成為野蠻的、失能的民族，亟需英國以遠征武力迫使其產生改變；在〈中國〉二文中，中國則更進一步淪為一具無能的母體，無以養育萬千子女，更成為英國軍事與帝國主義下的刀俎魚肉。

在這樣「能」的多樣化與變異中，也許可以回應到貝若以降諸多學者對於德昆西書寫亞洲的討論。例如李斯克(Nigel Leask)探究德昆西對於東方的異族恐懼(xenophobia)，注意到亞洲相對於擴張的大英帝國而言，是個懶散的存在，雖是個可供帝國侵略的對象；但對於當時急速擴張的帝國而言，亞洲的狀態更像一則提醒，尤其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是如何因驕傲自滿而疏於精進、停滯不前，而輕易被歐洲文明超越。除貝若與李斯克的精神與病理學分析之外，基森(Peter J. Kitson)則認為，德昆西找上亞洲作為其代罪羔羊，與十八世紀興起的人類學以及種族理論不無關係。基森認為，當代盛行一時的、白人優越於亞洲人的種族理論，「凌駕於宗教、經濟、以及商業論述」(213)。而當代亞洲人種的論述，對於「文明的中國人」以及「野蠻的韃靼人」間，也從過

去十八世紀兩者間涇渭分明的分野，逐漸統合成蒙古種族的一支。基森的觀點在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獲得更全面性的闡述與證實。奇邁可認為，在十八世紀末期由布盧門巴赫（Blumenbach）與邁納斯（Christoph Meiners）的倡議下，將世界人種主要區分為高加索人與蒙古人種。歐洲由高加索人種覆蓋，而亞洲（尤其是東亞）則被列為「蒙古人種」的區域。有趣的是，在東亞國家被列為「蒙古人種」後，整個東亞地區都顯露出「蒙古人種」的性格特色：「蒙古人種」仍具有四處遊蕩、具備潛在危險性的性格，並隨時可能捲土重來。十三世紀時蒙古人西征建立的帝國，涵蓋整個中亞至近東，甚至少部分的東歐國家。雖然絕大部分的歐洲領土並未遭蒙古人侵略，但歐洲對於蒙古人野蠻原始的恐懼，來自於蒙古人種侵略的高度「動能」，而統御的「權能」也隨之而生。然而，當蒙古帝國不再，加上地理大發現後，由歐洲主導更全面性的、更海陸兼具的遠征探險，顯示了歐洲在智識與技術上，超越並取代亞洲當時所具備的「動能」。在歐洲中心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都愈形發達的情況下，對於亞洲的想像僅剩「未開化」與「原始野蠻」等想像，而這樣的想像更落實在十八世紀多種商賈紀錄、旅人遊記，以及傳教士信函中。¹¹ 這些紀錄，也包含了對於「蒙古人種」的外貌進行嚴格的批判，其中也包括將喀慕克人的外貌形容為「醜陋」與「畸形」。而對於這些由內在性格的評論出發，形成系統性的、對於外在生理特徵的批判，脫離了十八世紀部分歸咎於氣候或文化的觀點，進而轉向更符合當代科學與種族論述的角度：遺傳。以此論之，「蒙古人種」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包括整個東亞（以及少部分的南亞），而遠東國家的種族特色，也因之常與遲緩與落後的描述相關連。奇邁可也提到，這樣的刻板印象，亦與西方對中國（或泛東亞）文化的喜愛與藝術風格的迷戀逐漸消退，「中國迷戀」（*Sinophilic*）逐漸轉為「中國恐懼」（*Sinophobic*）。即便當時歐洲普遍的理解都是東亞文明較歐洲文明先一步達到輝煌境界，但長久以來已失去前進的動力而停滯不前。¹²

以當代的科學思潮觀之，「動能」（以及應運而生的「才能」與「權能」）所激化作者的焦慮，也許更能說明德昆西針對亞洲主題書寫的持續

¹¹ 史密瑟司特（Paul Smethurst）亦提出觀點，認為旅行寫作（無論目的是宗教、商業或是軍事）為歐洲中心的西方知識界探索未知、提供「動能」（mobility），並且回饋給當代的歐洲帝國的「中心」，進而將知識作出更有系統性的整理。獲取知識的行徑得到動能，想像與慾望驅使更多旅行寫作的發生。由歐洲中心所代表的西方，成為動能、科學、與現代化進步的代名詞，而「非西方」的世界則僅剩歷史與地理的「靜態」（*stasis*）（1-18）。

¹² 關於黃種人的論述，請參 Keevak。關於十八世紀歐洲對中國風的迷戀與轉向，已有諸多著作細加討論。例如 David Porter 在 2001 年的 *Ideographia* 以及 2010 年的 *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都有精彩論述，在此不贅述。

關注。更精確而言，筆者認為，在大都會積極擴張、帝國亟欲向外征服的「動能」帶動下，德昆西的書寫，也許更反映了作者的主體，在面對個人、都市、國家、帝國的多重「能」的展現下，必須隨之而「動」的焦慮。換言之，在充滿「能」的當代氛圍中，「停滯」(immobile)與「靜態」(stasis)所象徵的「失去動能」(motionless; immobility)，終究可能成為「無才」(incapability)，進而淪為「失勢」(powerless)。也因此，無論是《自白》、重譯康德、〈喀慕克〉、或中國主題的系列書寫，一旦「停滯」，就註定了「無能」以及「失勢」。當作者的身體從放逐或漫遊的「動能」走向禁錮，他便失去了智識的「才能」與發聲的「權能」；對康德的譯文中，中國正是因為文化上的停滯，而成為愚蠢的文明；在〈喀慕克〉文中，一旦定居失去了在地理空間上移動的「動能」，喀慕克族也缺乏邁向真正（基督教）文明的可能性；在中國系列的書寫中，中國更是因為文化上的故步自封與停滯不前，使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都缺乏能動力，只能淪為歐洲「動能」下，失勢的、承受列強魚肉的慾望對象。在當時科學與種族論述之盛行，在帝國的擴張下，對於未知的探索充滿了將之收編、系統化的驅力。因此，在德昆西的亞洲書寫中，殖民主義的方興未艾充滿「動能」，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或文化上，都有向外的驅力；因此亞洲，尤其是在外交上令英國再三吃驚受挫的、靜滯不前的中國，便成為帝國陰影下，作者對於「動能」焦慮的代罪羔羊。

綜觀德昆西的亞洲書寫，不僅是英國主體與他者的對話。更重要的，也許是揭露作者對於個體停滯、無才與失勢的焦慮，更提示了「能」——尤其是「動能」——在當代愈形舉足輕重之重要性。在藥物使用下，藥效與個體身心的作用；在都市發展中，個人與群體的交會，以及社經階級的區分與流動；在殖民主義的興盛時，英國（甚或歐洲）與東方的遭遇，以及亟欲對亞洲進行編制的種族與科學論述之興起等等，都有「能」居於其中，或為衝突，或為磋商。也因此，這些交會、遭遇、作用與興起，在在都顯示了「動能」在當代獨有的溝通與輸運經驗，並藉此展現出「才能」與「權能」的多重樣貌。也因之，德昆西的書寫，並不僅是為現代讀者掌握當代的高度「動能」，而更是反映作者的主體如何調度己身之「能」，以因應時代的脈動。藉由鴉片的媒介所引發身體的放逐與漫遊，或心智想像的輸運力量，作者的書寫不僅是主體與他者間的對話，也是主體面對異動頻繁的當代世界，所必須採取的溝通形式。換句話說，作者所欲藉書寫克服的焦慮，正是憂心面對世界高度「動能」的生產下，己身缺乏相對應之抗力。因此，筆者認為，唯有藉由探究論述德昆西面對亞洲主題書寫「能」的多樣性，才能使作者的英國主體與亞洲他者間，在溝通與輸運的衝突與協商中，呈現完整的系統化脈絡。

引用書目

中文

彼得·艾迪 (Peter Adey)。《移動》(Mobility)。徐苔玲、王志弘譯。新北市：群學出版社，2013。

英文

- Adey, Peter. *Mo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Print.
- Barrell, John. *The Infection of Thomas De Quincey: The Psychopathology of Imperialism*. New Haven: Yale UP, 1991. Print.
- Berg, Maxine and Helen Clifford. *Consumer and Luxury: Consumer Culture in Europe 1650-185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9. Print.
- Bewell, Alan. *Romanticism and Colonial Diseas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2003. Print.
- Burgess, Miranda. "Transport: Mobility, Anxiety, and the Romantic Poetics of Feeling." *Studies in Romanticism* 49.2 (2010): 229-60. Print.
- "Capability."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Web. 25 Apr. 2016.
- Chandler, James, and Kevin Gilmartin, eds. "Introduction: Engaging the Eidometropolis." *Romantic Metropolis: The Urban Scene of British Culture, 1780-1840*. Ed. James Chandler and Kevin Gilmarti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1. 1-44. Print.
- Clej, Alina. *A Genealogy of The Modern Self: Thomas De Quincey and the Intoxication of Writing*.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5. Print.
- De Quincey, Thomas. *The Works of Thomas De Quincey*. Grevel Lindop, gen. ed. 21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03. Print.
- Fay, Elizabeth. "Hallucinogenesis: Thomas De Quincey's Mind Trips." *Studies in Romanticism* 49.2 (2010): 293-312. Print.
- Higgins, David. "'The Universal Nation': England and Empire in Thomas De Quincey's 'The English Mail-Coach.'" *Romantic Englishness: Local, National, and Global Selves, 1780-185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62-75. Print.
- Hobhouse, Hermione, ed. "The West India Dock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urvey of London* 43-44 (1994): 248-68. *British History Online*. Web. 26 Mar. 2016.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survey-london/vols43-4/pp248-268>>.
- , ed. "The East India Dock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urvey of London* 43-44 (1994): 575-82. *British History Online*. Web. 26 Mar. 2016.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survey-london/vols43-4/pp575-582>>.
- Jarvis, Robin. "The Glory of Motion: De Quincey, Travel, and Romanticism."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34 (2004): 74-87. Print.
- Keevak, Michael.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2011. Print.
- Kitson, Peter J. *Romantic Literature, Race, and Colonial Encount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rint.
- Krishnan, Sanjay. "Opium Confessions: Narcotic, Commodity, and the Malay Amuk." *Reading the Global: Troubling Perspectives of British Empire in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7. 59-94. Print.
- Leask, Nigel. *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 The Anxieties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4. 59-94. Print.
- Mathieson, Charlotte. *Mobility in the Victorian Novel: Placing the N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rint.
- "Mobility."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Oxford UP, April 2016. Web. 25 Apr. 2016.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Oxford UP, Ap. 2016. Web.
- Porter, David. *Ideographia: 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1. Print.
- . *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0. Print.
- "Pow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Web. 25 Apr. 2016.
- Rzepka, Charles J. *Sacramental Commodities: Gifts, Text, and the Sublime in De Quincey*.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1995. 4-16. Print.
- Smethurst, Paul. Introduction. *Travel Writing, Form, and Empi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obility*. Ed. Julia Kuehn and Paul Smethur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18. Print.
- Starr, G. A. "Defoe and China."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3.4 (2010): 435-54. Print.